

潜力系列

翁礼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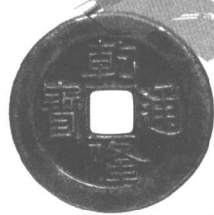
錢財兩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潜
动
力
系
列

錢財兩面

翁礼华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钱财两面 / 翁礼华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11

(潜动力系列)

ISBN 7-5339-2075-9

I .钱... II.翁... III.①财政管理-研究-中国-文集②税收管理-研究-中国-文集 IV.F8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751 号

潜动力系列	
钱财两面	
翁礼华 著	
责任编辑 邹 亮 封面题字 陈 进 设计制作 张妙夫 特约编辑 王非文(文字) 吴小花(美术)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363 千 印张 19.75 插页 4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075-9/I · 1728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钱财两面

从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异于禽兽无几的上古时代，演变到现代文明社会，其间的中国有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秦王灭六国，汉唐雄天下，宋元通四海，明清盛转衰的变化。对这一系列历史变革的论述，人们往往沿袭“二十四史”的写法，以朝代更换为主线，将历史仅仅讲述为政治史，受制于一种以政治为主导的史学观；政治腐败与政治斗争成为历史题材的主要内容，一兴一衰，循环往复。这样的历史叙述既有悖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也不符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决定力量的普遍真理。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从欧洲破土而出的近三百年来，不仅使世界面貌急剧改观，也引发了中国从清末到今天的百年巨变。这一切更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开辟新的视野，以经济的视角面对历史，用文化的变迁反观经济，从而将历史更多地叙述为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经济史，社会不断进步的文化史，并且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感受历史发展中“以人为本”的潜在动力。

其实这一人本之力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有人剖析过，这就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他在巨著《史记》中向人们揭示了人除拥有天生的利人利群冲动外，还拥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趋利理性。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宋明时代儒学吸收佛、道理论逐步神学化，进而发展成哲学化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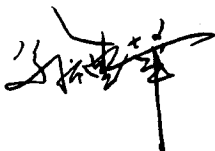
学,才使这一原本十分显性的社会动力被“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以理为本”所掩盖,走向地下,成为“潜动力”。即便如此,这个后来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强大动力,数千年来对中国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还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诸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平等竞争的科举选官制度,卖官鬻爵、出卖僧道度牒平衡财政的理财奇招,崇公抑私的专卖政策,“众生是佛,佛即我心”的中国化佛教,僧人种茶、制茶、饮茶、茶禅一味的茶文化与税收互为表里,官商勾结取势求利成就红顶商人的致富之道,等等,无不体现了人本之力的作用。至于“潜动力”在社会管理层面上则往往外化为以金钱计量的赋税、财政、金融的收支管理以及遍及全社会各行各业的理财思想,它们以不同形式推动着表面上重义轻利的古代中国蹒跚前行。

经过两千年人性压抑的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一代新风,原本封闭的社会终于逐渐放开了对个人追逐利益的人性认可,让“潜动力”慢慢浮出水面并日益显性化。因此,在强调“以人为本”推进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研究“潜动力”,以便向世人揭示其中利益驱动之奥秘和应遵守之秩序。为达此目的,我经过多年的酝酿,陆续撰写了近百篇财经历史随笔,从中选出48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组成《钱眼读史》、《运财帷幄》、《钱财两面》三本书,并冠以“潜动力”作为涵盖三书的丛书之名。《钱眼读史》有12篇文章,主要反映财税政策导向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运财帷幄》有22篇文章,主要反映

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财之道：《钱财两面》有14篇文章，主要反映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的历史文化特点。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其历史漫长而又丰富，要想用有限的篇幅、简洁的文字来揭示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全貌，穷其细节，具其始末，绝无可能，对人生苦短的读者而言更无此阅读余暇。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陷于冥思苦索、难以开笔的我偶然从中医针灸治病刺一穴而动全身中得到启示，豁然开朗，以经济视角选择了若干历史文化关节点，运用以小见大、化繁为简的随笔形式进行剖析，只有这样才能“窥一斑而知全豹”，以较少的篇幅和较短的阅读时间来洞察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事半功倍。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后，获得了行家们的首肯。由此，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促使我进一步以文化的视角面对经济，融历史、经济、文化三者于一体，七八年间写出了数百万字的文稿。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精心策划下，其中的主要篇章得以出版面世，不胜感激之至。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自知粗陋之作很难满足读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要求，因此，祈望诸君以己之高见，指陈作品缺失，不吝赐教作者于万一！



2004年9月8日

2	远去的漕粮
28	说张飞话古驿
52	官民同乐说庙会
66	布帛及其征收
100	筵席及筵席税
120	当铺与当税
140	最后的厘金
158	茶禅一味始成税
170	十年一觉扬州梦
190	千秋冤结一抔土
222	万松岭上话书院
244	公车上书与科举制度
272	独照长门宫里人
292	卖爵亦自赈灾始

远去的漕粮



农历九月初九，乃中国传统的重阳节，也是如今的老人节。这一天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有登高的习俗。早在公元718年，时年17岁的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公元701—761）就曾写过“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七言诗，全诗充分表达了他重阳节怀乡思亲的深厚感情。

杭州的吴山，春秋时地处古吴国之南境，与越国隔钱塘江相望而得名，且历史上杭州百姓一向在此山上供奉杭州市阴间的“市长”——城隍，故也称城隍山。此山地处市区之中，是市内的制高点之一，故在此山东北隅的东岳庙前至今还有始建于南宋的瞭望台，以便随时在“城隍山上观火烧”，及时组织消防减少损失。同时此山的地理位置也成了千百年来杭州百姓登高望远之所。而今年的重阳节又恰逢杭州吴山城隍阁新建开放的第一年，因此引发了浙江省地方税务局离退休老干部的极大兴趣，他们相约爬山登阁，饱览湖山秀色，体验宋代柳永所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之旷古情怀。这些老人大都生活简朴，对世事豁达开通，所以身体皆十分健康，对他们来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老年也是好季节”。尽管我离退休尚有许多时日，但本着人生是过程，尊重老人便是尊重自己，追求过程胜过追求结果的原则，随同这些令我尊敬的老同事，登上了吴山之巅。当我跨越台阶，站在平台之上，抬头仰望巍峨俊秀的城隍阁之时，猛然在东门二楼两侧看到了一副明代奇才徐文长撰写的“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的登高望远联语，不禁暗暗为之叫绝。历史悠久的胜景，繁华宽广的城市，竟在视野一放一收的22字联语

中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在吴山大观平台南侧，我也看到过多副登高望远的联语，撰者似乎都已尽心尽力，但恐怕由于体验不深、功力不足的缘故，皆不及此联之意境能激发起我内心的共鸣。可见，文学乃人学，能震撼心灵的作品才称得上上品。

登临阁顶，俯视吴山上古老的小普陀、药王庙和尚存的茶馆，皆历历在目，尤其是茶馆前枝繁叶茂的宋樟掩映处，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杭州阜康钱庄的年轻伙计胡雪岩（公元1823—1885）出没其间，襄助贫困潦倒的八品候补盐大使王有龄进京投供。王有龄后累官至浙江巡抚。感恩戴德的王有龄不仅与胡雪岩结成莫逆之交，而且利用自己的权势帮助胡雪岩用财政国库间隙资金开设钱庄，经营商业，获取厚利。胡雪岩通过对官府势力、漕帮首领和外商买办的层层投靠，左右逢源，很快得以暴发，终至在上海、杭州立足，由一介市井布衣跻身于晚清江浙富商大贾之列。至今吴山北麓尚存胡雪岩故居及其胡庆余堂药厂精美而宏大的建筑。在不知不觉遐想中猛地回过神来，抬头远眺四周美景，东方钱江奔涌，沃野千里；南方山峰如堵，苍翠绵延；西方湖山秀色，妩媚动人；北方街道星罗棋布，房屋鳞次栉比。待到极目延安北路尽头，武林广场北侧就能隐约地看到一条



建于杭州吴山的杭州城隍庙旧照



吴山天风旧照



清代胡雪岩创办的中成药厂——胡庆余堂

蜿蜒北去的河流，这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起点。今天，它是人们客运和货运的通道，而当年的开凿却是为了便利江南赋粮运往京师，是封建王朝实物赋税运输的交通干线，不仅历史上隋唐以降凡建都北方的王朝都靠它维系军队和政府的粮饷俸给，而且明清两朝修建皇宫的砖瓦、木材等大量建材也由此河北上，故有人称北京是运河上“漂来”的城市。漕粮运输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官货运输和日益兴盛的民间商品交流，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东昌(今山东聊城)、临清、德州、直沽(今天津)等城市“四方商贾辏集，多于居民者十倍，诚繁华之地贸易之所，天下之都会，京师所倚重者也”。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朝廷沿水道设钞关，按船只大小征收以纸钞为主的来往船税。当时国内主要钞关有8处，其中7处在运河上。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户部所属24关年定额税银400万两，运河上的关税则为126万两，占全国24关关税总额的30.15%。著名的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当年就从这条专运官粮的漕河中获利崛起，可见其作用非同小可了。

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且边境威胁又来自北方民族，故大多在北方建都和屯兵戍边的朝代都面临着北方所需粮食浩大，当地又供应不足的问题。朝廷在发展当地农业生产的同时，不得不寻求外地税粮调入。如秦汉时代朝廷将河南的赋粮转运陕西，隋唐以后，将东南的赋粮转运西北。当时的运输手段有陆运和河运两种，河、陆相较，河运优于陆运，盖河运挽运量大，不但迅速，而且费用节省。伴随着运河的不断开凿和贯通，赋粮从河道转运就成了我国赋税调运史上的重要环节，其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也就成了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重要一



建于清同治年间，亭台湖泊浑然一体的胡雪岩故居。

清代在月光下
利用白板映照捕鱼
的黄河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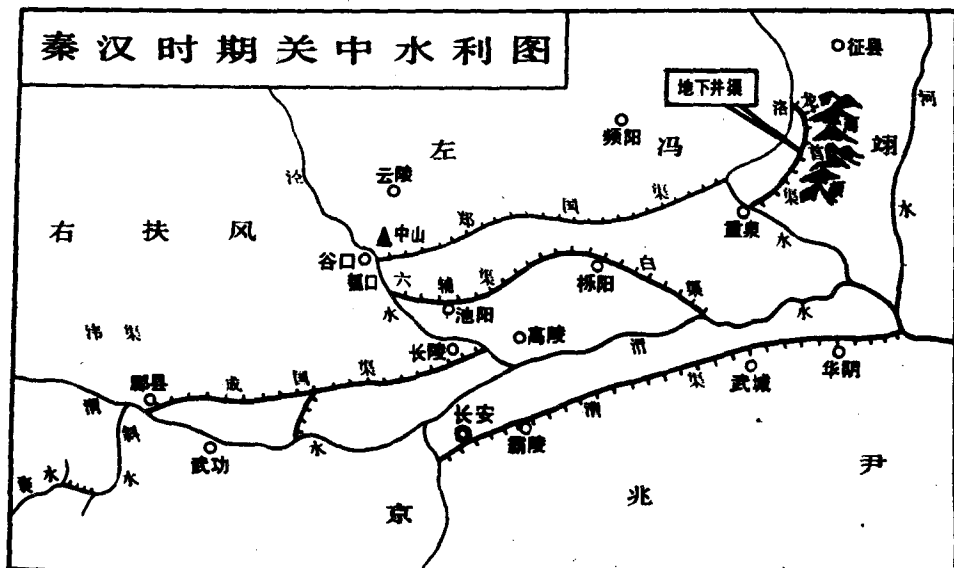


页。

中国历来就很重视水利建设，如舜时即因鲧治水无方而杀之，并任用其子禹为司空，负治水之责，禹以疏导为主，治水大见成效。作为水利专家，禹被推选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可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方针。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诸侯各国皆注意兴修水利，引黄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如魏文侯时（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邺令西门豹在今河北临漳一带开挖和疏浚河渠12条，引黄河之水溉田。秦国命著名水利专家郑国主持泾水流域的巨大水利工程，把陕西4万顷盐碱地变成良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由于当时诸侯国家一般地域狭小，人口集中程度不高，兵饷俸给需求有限，所以大规模长途漕运赋粮尚未出现。

秦汉时期，朝廷注意北方水利开发，如西汉武帝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前129年），朝廷令水工（相当于今水利局局长）徐伯率民工数万，历时三年开凿由京师长安至黄河长约300里的漕河，不仅大大缩短了关东至长安的漕运时间，而且使临近河渠的1万多顷的土地皆成良田。此后又相继兴筑龙首渠，开发洛河水利，筑六辅渠灌溉郑国渠所不能灌及的高地。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引泾水以注渭水的白渠工程更为巨大，仅开渠即逾200里，灌田超过4500余顷。兴修水利成了西汉朝廷的中心工作，其盛况正如班固在《汉书·沟洫志》中所指出的那样：“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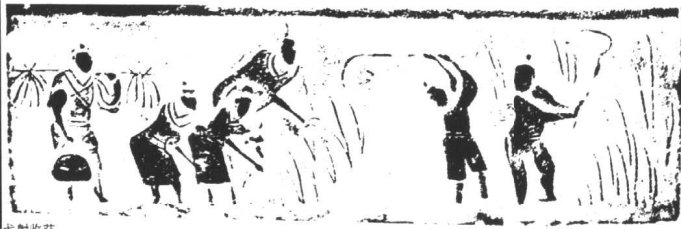


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轺、成国，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他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因此，不仅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迅速增加，而且农村也颇为富庶，尤其是渭水流域为主的关中地区，八百里秦川成了国家的谷仓。当秦末楚汉相争之际，两军对峙于荥阳，汉军全赖萧何转输关中的食粮，军队得无断炊之虞。张良也曾以“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来赞美关中的富庶。此后百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关中其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其富十倍居其六”。因此，秦汉时期，京师食用、边境军饷主要由关中地区自给为主，不足部分方由关东漕运补给。当时的关东泛指今河南、山东两省及山西、河北南部地区。在整个汉朝，关东生产的食粮在国家财政收入比重和漕运供应上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当时每年向京师长安所提供的食粮，在公元前200年前后为数十万石（每石合今0.3425石），到宣帝五凤（公元前57—前54年）中，“岁漕关东谷400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为了漕粮运输，筑仓造船，一次开工国家财政支出即达2亿钱。随着岁月推移，官员的冗滥，至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关东漕粮西运猛增至600万石。尤其关东的河内地区（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在东西汉交替的时代乃当时重要粮食产地。刘秀在争夺天下时，曾对河内太守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河内由于灌溉系统完善，生产条件优越，农产品不仅单产高而且总产

公元前251年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使川西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四川因而成为“天府之国”。



汉代画像砖《收割图》反映了兴修水利使农业生获得丰收的景象。



量稳定，从而使主要依靠粮食为主要实物税收收入的刘秀有了争夺天下的谷仓基地。当刘秀登基为光武帝统一全国时，就不再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国都，而确定洛阳（今河南洛阳）为京师，史称东汉。自秦以降，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中央政府，为了减少关东地区向关中地区食粮漕运的压力，终于第一次将首都东迁，成了中国赋粮漕运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争频繁，中原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再加上地方军阀征兵税饷，庶民百姓在战争和苛税的威胁下四处逃亡，或北走冀州，或东徙辽东，或西入巴蜀，山东南部 and 淮河流域人民都渡江南下。黄河流域随着户口锐减，水利设施破坏，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冲击，一直到隋唐时代也未完全恢复，以后更一朝不如一朝，灌溉面积日益锐减。如陕西的郑国渠和白渠在唐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溉田为1万余顷，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减为6200余顷，北宋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又减为2000顷。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不断衰败对封建朝廷的首都食粮来源带来了严峻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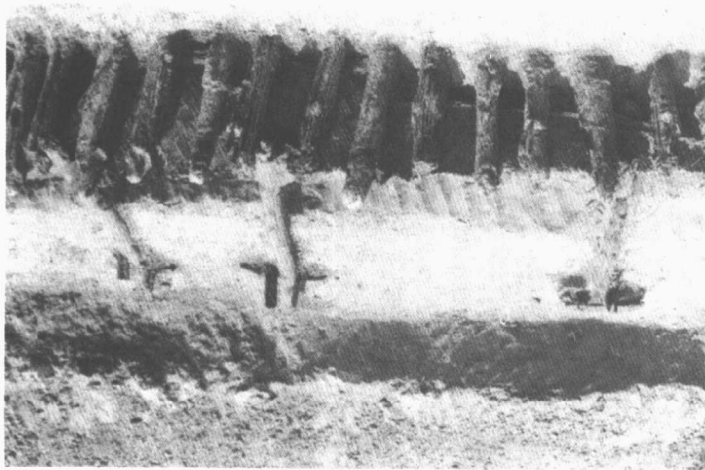
汉武帝时期，江淮以南还是地旷人稀、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汉末至三国纷争，淮河流域经常驻扎着大批军队，曹操等军阀为取得战争胜利不得不行军屯之法，利用军队作为劳动力，生产自给，筹集军饷。当年曹操就曾令扬州刺史刘馥修筑芍陂、茄陂、七门、吴塘诸堤岸，挑修沟通淮河的睢阳渠。同时，令邓艾兴修寿春的水利，在颍南北开凿沟渠300多里，溉田2万余顷。从此，淮河南北，东起寿春，西至许州，灌溉系统日趋完善，农业生产条件日益完备，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每到收获季节，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江淮地区终于建设成了国家赋税来

源的重要基地。淮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一方面成为东晋、宋、齐、梁、陈各朝代抗拒北朝的经济基础和战略要地,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创造了过渡地带,起到了示范作用。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大批进入中原,占据统治地位,导致黄淮流域人民不断南迁江南。中原百姓大规模南渡,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他们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而且把北方优良的农业生产的治水经验传播到南方。由于长江流域潮湿多雨,河流纵横,湖泊遍布,自然条件优越,所以水利开发的潜力极大,农业生产发展的潜力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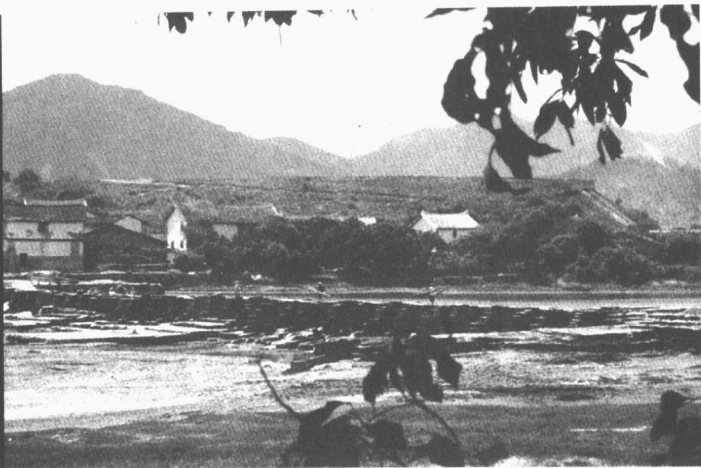
东晋王朝从南渡之始即开始注重水利建设。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兴修曲河新丰塘的水利,溉田800顷;兴修练湖水利,供灌溉和船运之需。自东晋历南朝、宋、齐、梁、陈200余年间,朝廷一直在集聚民力凿塘筑堤,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不断改进农耕技术,从而使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持续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宋书·孔季恭传》谓江南之地,自晋室东迁,至孝武帝(公元373—396年在位),凡百余年间,局势安定,生产发展。至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公元457—464年),户口繁衍乡间富庶,一年丰收数郡无饥,膏腴数十万亩,地价上涨,亩值一金。

公元581年至617年,杨坚建立的隋朝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公元618年至906年的唐代则从根本上结束了黄河流域始自东汉末年历时400年的战乱,实现了长期的统一和安定。由于唐王朝定都长安,所以十分重视关中地区的水利设施的恢复和兴建。但由于环境的恶化和农技人才的流失,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还是难以恢复昔日的盛况。相反,长江流域的开发却突飞猛进。江西、湖南开渠溉田1



五代吴越国捍海塘遗址

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的福建莆田木兰陂抗咸蓄淡灌溉水利工程



万多顷。江浙地区的常州、句容、杭州、会稽开凿沟渠，引水溉田数万顷。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皆迅速增长，环太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变成了全国粮食的主产区和历朝政府赖以调运赋粮的谷仓。

五代时，据有十四州的吴越国，十分注重太湖流域的开发，在苏州专设营田军8000人，从事导河筑堤以防水患；在明州（今宁波）东钱湖、杭州西湖等主要湖泊设置“撩清军”，专门负责水利疏浚工作；钱塘江沿岸分堡置兵，从事江堤砌筑和护卫工作，至今杭州还有一堡、三堡、九堡一类的地名。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军队编制从事常年水利建设之始，它与北宋以军人组织“潜火铺”从事专业火灾消防工作一样具有首创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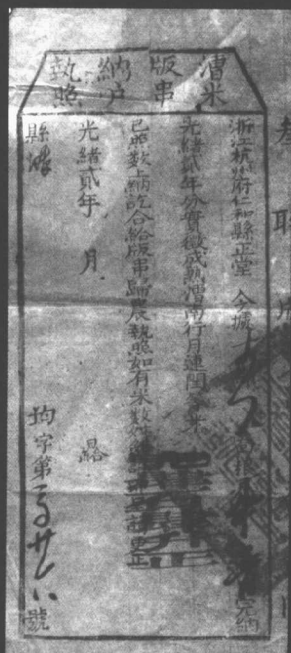
到北宋时江、淮、两浙不仅修复了宋初由于战争所荒废的许多圩田和其他水利设施，还大力兴建了许多新圩田。这种圩田又称围田，有坚固的圩岸把河、湖水隔开，圩岸之内有河渠，多余的水可以通过水渠排泄出去。圩岸上有闸门，天旱时开闸门，可以放进河、湖水灌溉圩内之田，灌时关闭闸门，挡住河、湖之水以防水患，可以做到旱涝保收。至北宋中期以后，太湖流域及长江沿岸的许多地方都有规模相当大的圩田。据沈括《万春圩记》载，从宣州到池州有圩田千区以上，其中万春圩有田12.7万亩，圩中有大道长22里，整个圩区像一座大城池。在江南河、湖之滨，不仅有像万春圩那样的大圩田，还有300—500亩的中小圩田。苏东坡曾说：“浙人喜于丰岁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圩，高下殆遍。”他还运用“与水争尺寸”的词句描述了江南水乡农民寸土必争兴修圩田的精神。在山地地区，垦田的形式是大量修建梯田，江西抚州、袁州等地农民在山岭上开辟耕地，层层而上直至山顶。福建路（路，相当于今日之省级行政区）农民也把圩

多山坡开垦成阶梯那样层层而上的梯田，并且“缘山导泉”，利用山泉灌溉，有诗写道：“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崖嵬犹力耕。”韩琦更是用“山鸟过云语，田夫半岭锄”来形容梯田之高耸。圩田和梯田的垦辟，一方面反映了宋代百姓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土地的充分利用和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说明宋代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平衡还缺乏科学的认识。

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时期，由于大批北方民众南渡和国土疆域的缩小，朝廷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百姓的生计和政府财政开支的需求。故《宋史·食货志》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南宋150余年由国家主持的大型水利工程达56项。南宋前期，不仅修复了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大量陂塘，还兴建了许多新的水利设施。据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统计，江东共修塘沟堰22400余处，淮东修治1700余所，浙西修治2100余处，镇江府的练湖七十二源以及明州东钱湖等水利工程都先后得到了修治。一些阻塞的河道也进行疏浚。在沿海许多地方则筑堰置闸，阻挡海潮侵淹良



浙江省嘉兴府石门县十一都农民
张永发太平天国时期的完纳漕粮执照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
年）浙江省仁和县（今杭州市
之一部分）漕米版串纳户执照



清 焦秉贞绘
制的《御制耕织
图》之一

田，其中最著名的有秀州（治所今浙江嘉兴）、华亭（今上海松江）的捍海塘和淮东的绍熙堰。绍熙堰修成于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全长数百里，使淮东数百万顷低湿土地变为良田。在兴修水利过程中，许多杂草丛生的荒泽被垦辟成田，仅湖州一境，因修筑太湖堤岸使10万亩草荡变成良田。两浙农民还把许多旱地改造成水田。海堤的修筑则使淮东、两浙、福建等路出现大量海退泥田。福建沿海人民还自备本钱，围垦了许多海滩，温州沿海的广大海滨更是无地不耕。这些新垦的农田有许多水稻田。与此同时，南宋政府还大量修复北宋末年在江淮一带的圩田，下令凡有官圩田的州县，通判（相当于今地级市副市长）和知县都带兼管圩田官衔，命令各州县把破坏的圩岸迅速修复，还委派拥有大量私人圩田的大地主为圩长，限定他们在每年秋收后召集本圩人夫增修圩岸。绍兴（原称越州，宋高宗绍兴元年以年号改易地名）的镜湖、鄞县的广德湖、萧山的湘湖、仙居的赤湖皆相继围垦成田。仅鄞县西乡广德湖垦出圩田700多顷，每年可收获的稻谷就不下数十万斛。

明代，对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仍很重视，尤其对支撑国家赋粮主要来源的太湖流域更是关怀备至。当时按水源情况划分成四个地区：其一是杭州嘉兴区；其二是湖州区；其三是苏州、松江、太仓区；其四是常州、镇江区。并采取措施扩大灌溉面积，如杭州府属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开河溉田4000亩，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凿河70里，改荒地为本田者达1万余亩。如湖州府属由洪武至天启年间，较大水利工程10余项。由洪武至崇祯，苏、松、太三府州较大工程37项，修筑堤渠动辄数以万丈计。常州、镇江两府在明代较大工程10

